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

airiti Library

神話與紀實　倫敦的認同論述與文學想像

Myth-Making and Realism-The Self-Fashioning of London as Modern Metropolis

doi:10.6711/REAL.200703_(10).0002

英美文學評論, (10), 2007

作者/Author： 宋美瑾(Mei-Hwa Sung)

頁數/Page： 51-72

出版日期/Publication Date：2007/03

引用本篇文獻時，請提供DOI資訊，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。

To cite this Article,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.

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:

To link to this Article:

http://dx.doi.org/10.6711/REAL.200703_(10).0002

DOI Enhanced

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（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, DOI）的簡稱，
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，
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。

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，

請參考　http://doi.airiti.com

For more information,

Please see:　http://doi.airiti.com

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，開始閱讀本篇文獻

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

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—華藝線上圖書館 ● http://www.airitilibrary.com ●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

airiti

神話與紀實
倫敦的認同論述與文學想像

宋美瑾

淡江大學英文系

摘　要

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約以文藝復興爲現代時期的開端。現代時期的諸多特質之一，便是都市的興起。倫敦作爲當時世界最大城市，第一個工業國家的首都，和粗具態勢的帝國之政經樞紐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它的人潮和動能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複雜多樣的人際互動。倫敦的建設由初期的西敏市和市區東西對峙，逐漸向郊外和泰晤士河南岸發展，利用無形的文化宰制力量進行社會性的區隔，劃分階級與族群的領域。文藝復興時期倫敦的認同論述訴諸神話傳統，至十八世紀，文學中的倫敦形象大量出現，較爲趨近現實，多自日常生活取材，再加想像潤飾，抒發觀感，各寫己見。本文擬檢視倫敦的認同論述與以「紀實」爲策略的文學想像，考掘文復時期神話建構與十八世紀「紀實」文學所具現的空間政治，用以凸顯神話大論述和紀實策略之間的轉折和扞格。

關鍵詞：倫敦、新特洛埃、羅馬、西敏市和市區、文化區隔、神話論述、紀實

《英美文學評論》10（2007）：51-72｜©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
收到稿件：Mar. 1, 2006｜ 接受刊登：Dec. 21, 2006

airiti

Myth-Making and Realism

The Self-Fashioning of London as Modern Metropolis

Mei-hwa Sung

Department of English

Tamkang University

ABSTRACT

The self-fashioning of London as Troynovant (new Troy) or Rome proliferates in quasi-historical writings, city custumals, and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. Eighteenth-century writers, including Edward Ward, Alexander Pope, and Tobias Smollett, opt for the realistic mode, tinting their descriptions of London street-life with a rhetoric that appeals to a social topography that polarizes The West End and The East End, center and margins. This paper provides a cultural reading of texts that rest on this dichotomous construct in the self-fashioning of London as modern metropolis.

Keywords: London, Troynovant, Rome, self-fashioning, social topography, The West End, The East End

airiti

倫敦自公元 5 年由羅馬人築牆建城，第五世紀羅馬人離去，又經中古時期，到了十五世紀藉由大儒如摩爾(Thomas More, 1478-1535)、柯雷(John Colet, 1467?-1519)和來自歐陸的依瑞斯默士(Desiderius Erasmus, 1466-1536)的經營與烘襯，文風鼎盛，享有人文主義之都的美名。此一文化能量由朝廷與倫敦市民(Court and City)競合維繫，協力發展，一方面維護都市的秩序，另一方面參與歐陸經貿活動，逐漸將現代時期的倫敦推向國際政經的核心。[1] 十六與十七世紀倫敦迭經都鐸王朝和司圖亞特王朝期間的宗教改革、內戰和復辟，在動盪不安之中人口與規模漸增。十六世紀末，倫敦市民約 20 萬人，到了十八世紀初已超過 50 萬人，爲歐洲人口最多的都市。倫敦人尋求自我定位，揉合了國家意識與宗教認同，而於十五世紀初有市誌的出現。倫敦市行政官員卡本特(John Carpenter)首開撰寫市誌之風，凸顯倫敦的獨立自主，稱頌倫敦享有「古代特洛埃城擁有的自由、權利與習俗」(Riley 54)，帶動日後此一文類與論述的流行。文藝復興時期倫敦的中產階級書寫市誌，共同參與了朝廷與倫敦市的併連文化工程，聯手打造一個「榮譽的共同體」(“community of honor”)，拉抬商人階級的身分。商人階級亦成爲國運的推手，以經濟的實力與朝廷平分秋色，並將此一階級追求利益的動能美化爲國家情操，協力爲帝國舖路。

史鐸(John Stowe, 1525-1605)於 1598 年出版《倫敦一覽》(*Survey of London*)，記述倫敦在他有生數十年來地貌和人事的變

[1] 這些人文主義者皆出身中產階級，在朝爲官如摩爾者戮力公職，曾任倫敦司法處副首長，亦曾奉亨利八世派遣至歐陸擔任經貿特使。人文主義與倫敦的轉型爲現代都會，參見 Lawrence Manley, Part I。

airiti

遷，在倫敦大步邁向現代都會化的進程中，緬懷兒時的點滴，以及昔日天主教社會的人情風華。1720 年史哲普(John Strype, 1643-1737)增補修訂此書，沿用同一書名，但淡化史鐸的天主教情思，歌頌倫敦在百餘年之間的快速成長，引領英國全境的政經活動。史哲普將功勞歸諸勤奮努力的新教徒。[2] 自此，倫敦的認同論述開始轉向新教與重商主義，結合國教君王所統轄的朝廷貴胄，以及享有行政自主權的中產階級市民，發展國內和海外貿易，建構文化與經濟的霸權形象和實體。

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約以文藝復興爲現代時期的開端。現代時期的諸多特質之一，便是都市的興起。倫敦作爲當時世界最大城市，第一個工業國家的首都，和粗具態勢的帝國之政經樞紐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便是它的人潮和動能，以及隨之而來的複雜多樣的人際互動。倫敦的建設由初期的西敏市和市區東西對峙，逐漸向郊外和泰晤士河南岸發展，利用無形的文化宰制力量進行社會性的區隔，劃分階級與族群的畛域。文藝復興時期倫敦的認同論述訴諸神話傳統，承襲古典典故，至十八世紀，文學中出現甚多對倫敦的記述，受到當時實證思潮的影響，其手法採紀實微觀，多自日常生活取材，再加想像潤飾，型塑倫敦的都會神貌。本文檢視倫敦於文藝復興時期興起的認同論述，與十八世紀以「紀實」爲敘事策略的文學想像，考掘文復時期神話建構與十八世紀「紀實」文學所具現的迥異的空間政治，用以凸顯神話大論述和紀實想像之間的轉折和扞格。倫敦的自我型塑主要的推手爲中產階

[2] 兩書的對照參見 J. F. Merritt。在此一個多世紀的期間，英國歷經重商思潮的抬頭與光榮革命，確立以新教教義爲骨幹的國族認同，標榜國家主體性與個人主義，形成 Max Weber 所稱的新教倫理與開明的資本主義。

airiti

級，包括知識份子和商人，並以男性爲主體。此一階級和性別屬性，在下文所討論的文本中並無例外。十八世紀記述倫敦的文學輯刊出版的不多。本文選材出自艾倫(Rick Allen)編纂之《移動的秀場：倫敦市井文學輯錄，1700-1914》(*The Moving Pageant: A Literary Sourcebook on London Street-life, 1700-1914*)，90 則選文之中十八世紀文本有 23 則，包括詩和散文，女性作者僅有 6 位，並無觸及性別議題。本文討論的文本，數量與議題皆有侷限，缺漏之處留待另文增補。

I. 神話建構：天命之帝國邦城

倫敦的認同論述早期依附希羅古典傳統，自文藝復興時期延續至十八世紀，蔚爲主流。羅馬人建造城牆，圈住方圓一哩之地，東起倫敦塔，西至荷朋與艦隊街，北起史密斯野地，南邊則濱泰晤士河，並以此河爲運輸幹道。此一古城至今僅殘餘片段的牆垣，其餘皆於十八世紀中葉拆毀。羅馬人建倫敦城仿照羅馬，以市區爲軸心修築通衢大道，以便與四面八方交通往來。羅馬人於第五世紀棄城，九世紀時亞佛烈德大帝重修城牆，進駐倫敦。十一世紀威廉大帝建造倫敦塔，且特准市民享有部分自主權。歷朝以來王權和市民權之間角力不斷，依麗莎白時期尤其明顯。倫敦於此時期商人權力日增，財力雄厚，街道巷弄錯綜複雜，密若蛛網[3]。房舍屋宇舊去新來，一派興旺，與西敏市的朝廷行政區形成對抗之勢。倫敦市長一職自十二世紀以來即是市區的最高行政

[3] 依據史鐸的敘述，徒步走完兩千餘條街道巷弄，總計約 250 哩路。見 Merritt p.2。

airiti

首長，下設治安官和議員，自擁一套司法制度，王權帝力不及於市區。倫敦形成一市兩區，分稱西敏市和倫敦市，兩區維持互動但對峙的均勢，君王給予市民某種限度的自主權，市民以金錢納貢回饋，創造雙贏的效果。

羅馬人於荒地建城，帶來經濟繁榮與社會秩序，所遺留之道路、建築以及典章制度，皆是正面資產，英國百姓多所感念。曼禮(Lawrence Manley)詳述倫敦的建城神話系譜，上溯至羅馬史詩《依尼亞德》(*The Aeneid*)，詩中確立依尼亞斯爲羅馬的創建者。《依尼亞德》肇啓建城與建構帝國的雙生一體的神話，利用預言和天命的修辭，鞏固帝國的合理性。依尼亞斯及其子孫由特洛埃出亡羅馬，另創新局，如此「西進」的文明擴展(westering of civilization)與建城創造帝國的使命感，暗合了倫敦的情境和英國的王朝所需。十二世紀初史家孟默思(Geoffrey of Monmouth, c.1100-c.1155)寫《不列顛帝王史》(*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*)，記述特洛埃敗亡之後，依尼亞斯的曾孫布魯塔斯逃至英國，決意建造一座大城，最後在泰晤士河畔擇址，建了新城，命名爲「新特洛埃」(Troynovant)(Wilson 89)。都鐸王朝的朝臣爲了鞏固王室的正朔，將威爾斯出身的王室族譜依附於亞瑟王的傳奇，並結合布魯塔斯的傳說。劇作家戴克(Thomas Dekker, 1570?-1632)稱亨利八世爲布魯塔斯的嫡裔(“the tall pillar from Brutus”)，依麗莎白女王也被稱爲「第二座特洛埃城的美麗女王」(“beauteous Queen of second Troy”)(Bowers IV,86)。後人考據倫敦一名的由來，係因頌揚魯德(Lud)繼承布魯塔斯的志業，將倫敦經營得更臻完善，因而以魯德取代「新特洛埃」而有 London 之名(Manley 183-184)。

airiti

古典史詩的大論述將城市的誕生與帝國的天命建構爲一體的兩面。英國在都鐸王朝進行的「文化翻譯」(*translatio*)也是依循此一策略，聯結王朝之建祚與倫敦的興榮。倫敦挪借特洛埃和羅馬的霸業，接續斷裂的歷史，企圖再現兩座城市極盛時期的豐饒、活力與秩序，爲帝國的合理性預作準備。1604 年戴克記述倫敦瘟疫肆虐的慘況，但仍然延續傳統神話，讚揚倫敦爲「新特洛埃城」，說它是「歐洲的珠寶；英國的玉石；偉大的耶路撒冷的姊妹；海神納普頓的寵兒(腰際環繞著緞錦般的泰晤士河)，除了疫病肆虐，別無缺憾；是世上都市的女皇，新特洛埃城」(Manley 184)。戴克繼承史鐸的神話傳統，添加古典典故，更進一步將倫敦比喻爲「穿著羅馬式華服的仕女，頭頂的髮飾上聳立著教堂尖塔、角樓和城垛……，左手握著一支金色的權柄……，顯示她是一國之君、萬民之后；她的右手握著一棵樹，樹上分出十二支主要的枝幹」(Bowers IV, 86)。十二支枝幹代表倫敦市十二個重要的商業公會(the Twelve Livery Companies)。[4] 倫敦的擬人圖像綜合特洛埃和羅馬兩座歷史名城，強調再現此二世代的輝煌盛世，人口興旺、財富傲世，既是政治霸權的中心，又展現榮譽、勤奮、效率和宗教虔敬等新教的美德，是榮華富貴與社會秩序的極致典範。

倫敦的神話想像自文藝復興初期，延續到十六世紀末，但於敘事之中逐漸增加歷史紀實的成份。史鐸的《倫敦一覽》，首先肯定倫敦的貴胄族譜：「正如羅馬，世界的首善都城，維持聲譽

---

[4] 十二個重要商業公會爲：Mercers, Grocers, Drapers, Fishmongers, Goldsmiths, Skinners, Merchant Taylors, Haberdashers, Salters, Ironmongers, Vintners, Clothworkers。參見 Porter, p. 30。

airiti

於不墜，源起眾神及其子嗣；倫敦乃特洛埃之後裔，威名遠播，可比羅馬，系出同源」(Manley 183)。史鐸接著加入紀實的成份，援引官方資料，採錄市井民眾的記憶，記述宗教改革之前的倫敦盛況。史鐸的《倫敦一覽》建構一則「歡樂英國」(Merry England)的神話，以倫敦爲英國的縮影，呈現一座物阜民豐、濟貧和樂、四時節慶不斷、敬畏上帝的理想都城。

波特(Roy Porter)在《倫敦社會史》(*London*: *A Social History*)書中強調王權與倫敦市自治權之間的紛爭，有別於史鐸的溫情主義。倫敦市長的設置始自 1192 年，由當時正率十字軍東征的理查一世欽點，目的爲了替戰敗被囚於德國的理查籌措鉅額贖金。市長統領議會(the Court of Aldermen)，權力猶如君王，下設司法人員(sheriffs)掌管治安與法律訴訟。理查一世對倫敦市的財富需索無度，得款揮霍於歐陸十字軍征戰的龐大軍需。倫敦市爲了換取行政自主權，不得不盡量供輸，如此的抗衡一直維持至後世。倫敦市長一年一任，皆自市議員中選出。兩大行政主體——西敏市朝廷與倫敦市區——之間的和諧互利，建立在一種微妙的經濟與政治的平衡。十八世紀倫敦文學之中甚多記述市長就職日的街頭脫序，其原始動能來自市民，志在展現倫敦市的強勢自主性，拒絕完全臣服於朝廷。此點於下文所討論的文本中可以得見。

II. 十八世紀的倫敦：文化的二分區隔

史崔普在十八世紀初年陸續增補史鐸的《倫敦一覽》，於 1720 年完工。新版的《倫敦一覽》由 1540 年代的倫敦開始，以第一人稱敘述當時時事，接著描述 1620 年代和 1650 年代的西敏

airiti

市，內容龐雜，顯然除了史鐸的原有資料之外，史崔普另外加入其他的倫敦市誌的內容。由於篇幅甚大，內容豐富，頗受讀者歡迎。史崔普的增補主要用以包括新地名、人物，以及有關工商發展的統計數字和圖表。主題上值得一提的是，新版《倫敦一覽》記述 1640 年代內戰和 1688 年光榮革命兩件大事，作者顯然認同國教的立場，與史鐸的天主教思維大有不同，具體反映倫敦跨越宗教改革，邁向商業都會的進程。史崔普語調帶著濃厚的道德說教，有別於史鐸的懷古溫情。史崔普著墨於倫敦各商業公會的濟貧慣例，列舉各項活動，特別稱許鼓吹道德重整的組織，例如「克己復禮促進會」(Society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)。史崔普也記錄了醫院與工廠的狀況。他另闢一章，討論王權和市民權之間的傾軋磨合，並且一再重申「市民的忠誠」(“citizens loyalty”)，敘述查理一世於 1641 年返回宮廷，市民爲他舉辦盛大的慶祝儀典，以證明絕大多數倫敦市民效忠君王。這個效忠朝廷的姿態其實說明了朝廷和市民之間的持續對峙，雙方皆致力於固守權勢的均衡，以維持體制的運作，同時各取所需。

1642 年的內戰與隨後近二十年的紛擾，使倫敦的經貿發展幾近停頓。1665 年的瘟疫和次年的大火，使得全城幾成廢墟。阮恩(Summerson Wren,1632-1723)設計了雄偉的重建藍圖，但未及全面實施，倫敦便迅速藉由民間力量重建，羅馬時代的棋盤式道路格局不復存在，新的建築形成複雜糾結但又逸趣橫生的迷宮似的街道網絡。光榮革命確立了英國人的新教認同，爲緊接而來的十八世紀舖設了重商和海外殖民的國家發展軌道。到了十八世紀初，英國已摩拳擦掌，準備躋身歐洲列強的行列，而倫敦的都會化與物質文明的鼎盛，也宣告其新教和中產階級定位的自我論

airiti

述的成型。世紀中葉之際漢諾威王室傳到喬治三世，已經擺脫了德國小邦的異族與鄉野的況味，正式與英國的國家性格印證認同。再者，1752 年英國終於放棄朱立安曆(the Julian Calendar)，採用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(Gregory XⅢ)於 1582 年所頒布的新曆，與歐陸各國的曆制同步，宣告英國鎖國心態的終結。十八世紀的倫敦見證英國歷史上的諸多大事：1707 年英格蘭和蘇格蘭兩個國會合併；1746 年司圖亞特王朝的殘餘復辟勢力由於央魯登一役戰敗而徹底瓦解；1760 年土生土長的喬治三世正式登基，使得君王亦徹底本土化；1763 年英國打敗法國，贏得「七年戰爭」，在海外嶄獲加拿大、印度和加勒比海的廣大殖民地。大英帝國的規模已大致就緒，倫敦即爲此一巨大結構體的中心。

倫敦建城神話的主題——「文明西進」——於十七、十八世紀具現於西區新式廣場和通衢大道的快速興建，形成「西邊」(The West End)。另一方面，由東面城牆向東延伸的郊區則另發展出雜亂的新移民的貧窮社區，俗稱「東邊」(The East End)。「西邊」豪宅聳立，公園綠意盎然，街道規劃整齊，中上階層的高級宅邸和時尚精品的購物區錯落雜陳，而「東邊」的建築物除了少數精華地標(阮恩所設計的幾座教堂，例如聖保羅教堂)，其餘無甚可觀，加上方圓一哩的城市上空籠罩塵霧，頗爲時人詬病。有錢之市民多移往「西邊」，或離城遷往鄉村。

「西邊」的發展始自 1630 年，廣場(如布倫斯伯里)紛紛出現，帶動周遭高級住宅區的興建。由於臨近國會和購物區，政客和富人皆以居住此區爲身分地位的表徵。外地來的人亦以落腳此區爲時尚之舉。相反地，「東邊」沿泰晤士河北岸一哩之地，則演變爲迷宮式的巷弄，夾雜著廉價旅店和紅燈戶，居民多爲討海

airiti

人、腳伕、酒店侍者等下層階級。西敏橋(1750 年)和黑僧橋(1769 年)陸續建成之後，橫跨泰晤士河，使得南岸逐漸轉型，由原來的荒郊，變爲草木扶梳的華宅區。倫敦的衛星城區的文化屬性多元複雜，1666 年大火之後一百年左右的倫敦，並未依照任何都市計劃的藍圖重建，而是依物以類聚和叢林法則的市場機制自由發展。如此的倫敦都會空間已然掙脫特洛埃、羅馬兩城的中央一統的神話框架，由資本主義的強大經濟力牽引，展現不同層次的文化區隔。「西邊」和南岸競相擴大地盤，「東邊」和以東一哩的北岸則困陷於迷宮式的地理與邊緣化的社會空間。

倫敦都市空間的文化屬性亦包含政治與宗教的因素。市民習於走上街頭遊行，同時大聲吶喊，爭取權益，高舉牌板，演出街頭劇等甚是平常。1760 年代自由派激進分子威克斯(John Wilkes, 1727-1797)極力反對喬治三世及宰相彪特(John Stuart, 3rd Earl of Bute, 1713-1792)的政策，引來許多市民上街爲他聲援。當時遊行示威多以憲法保障的人權爲訴求。西敏與倫敦兩市的男性多數享有投票權，選舉國會議員。他們的政治立場傾向改革前進，多數支持彪特的政敵皮忒(William Pitt, 1708-1778)的海外擴張政策。皮忒失勢去職之後，市民暗助他的同道威克斯競選市長成功，繼續與王權和政府抗爭。倫敦市愈益世俗化，市民百姓追求物質成長與政治影響力，教會的道德約束力量相形日漸薄弱。民間強調人際活動與娛樂休閒，都市中的街道和其他公共空間吸引大量人潮，市民日益以逛街、購物、逗留公園或咖啡座，以及觀看街道風景來打發時間。休閒與消費文化日益茁壯。中下階層喜愛雜耍鬥雞和拳擊賽，賭博行爲甚是流行。市區內娛樂場所觸目皆是，秀場、畫廊、劇院和鬥雞場等引來不同階級的觀眾，人潮

airiti

中攪和著跨越階級、職業和國界的男女老少，四下遊走在通衢大道或幽暗巷弄之中。倫敦的「西邊」則是一派優雅高貴，王公貴族在此處理國家大事，也享受豪奢的生活。聖詹姆士和五月節廣場再往西而去，就是倫獵和渥克士豪的各式庭園，奇花異卉，亭台樓榭，美不勝收，加以經年吹拂西風，把污濁的空氣吹向「東邊」，使得此區林立的皇宮、花園等更顯其田園綠意。荷朋區的街道極盡設計之美，查令路口有座「春園」，貝德福街的華廈戶戶前庭植滿花木。「西邊」的建築風格帶動園藝景觀設計的行業，打造此區「文明」的休閒消費文化。文藝復興時期的神話中的倫敦取樣特洛埃和羅馬，意圖繼承其「大一統」的中心威權，但是十八世紀時，歷史的倫敦卻是分裂的，地理和心理皆一分爲二，貧／富、貴／賤之間橫亙一道難以跨越的界線。

III. 十八世紀的倫敦「紀實」文學

倫敦的都市空間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受到銘刻，不同的地理位置被賦予鮮明的文化意涵。1665 年和 1666 年相繼發生的瘟疫和大火，使人口遽減，也使得都市的空間結構徹底地重整再造。在復辟時期至十八世紀中葉新古典主義式微之時，乃至前浪漫主義時期，倫敦都是重要的文學題材，詩人、小說家和劇作家甚多描寫倫敦，或褒或貶，發抒個人對此一都市的情懷與觀感，建構倫敦成爲不同的文化圖像，想像個人與不同的都會社群的關係。下文討論的文本以十八世紀爲主，自世紀初的渥德(Edward Ward, 1667-1731)至世紀末的布雷克(William Blake, 1757-1827)，摘取其要，用以例示在倫敦的現代化過程中文學家如何見證其樣貌，並

airiti

且參與其想像的文化建構，在「西邊」／「東邊」與褒貶愛恨的兩極之間擺盪。倫敦的都市質性包含龐大、動能、多元與消費活動等大端，在文本中有多樣互異的呈現。

與神話建構不同，十八世紀有關倫敦的描述多採紀實手法，以街道爲主要場景，敘述的內容交錯人、時、地和事件，以寫實的形式假托想像，用文字呈現倫敦政治、經濟、科技、社會與文化各層面的時空座標，賦予個人或階級群體的詮釋。這些作者多爲在地人，少數爲歐陸來的訪客，各有看法，愛憎互見。

十八世紀俗稱理性時期(The Age of Reason)，雖然失之偏頗概約，但是可以見證此一時期與實證主義同步發展的主流思想。其文學品味爲中產階級，文體印記爲寫實，文化認同則爲都會和重商。此一時期倫敦的文學描繪，其基調爲能量的併發，以及對脫序的批判。此一基調化爲多樣的文字描述，一再出現於艾倫的《移動的秀場》的選文中。艾倫所編文選始自 1700 年，以渥德爲首。渥德世居倫敦，經營旅店，寫了不少散文和詩描寫倫敦。他寫倫敦市長就職日的遊行，街頭一片活力與混亂。渥德在《窺記倫敦》(*The London Spy*)(1700)中，對此一年度盛典有如下的描述：

> 當日早晨市長大人率領隨從，先走水路，再轉陸路，前往西敏大廳覲見女王，依據長久以來無數前任市長的慣例，親吻(女王陛下的)皮手套，敬表效忠。我也穿戴整齊，保護自己的肉身免遭街上粗暴的群眾推擠傷害，這些暴民隨處任意作樂，隨機攻擊旁人，讓我提心吊膽。我和友人穿著老舊的外套，以抵擋暴民扔擲

airiti

> 的穢物，一路朝契普賽區走去，心想這個地方是觀看遊行隊伍最好的位置，最能感受這個儀式的壯觀氣派，但暴民的騷動也最為激烈，他們瘋狂的行徑最有看頭，但切記提防其危險。 (Allen 31)

一年一度的倫敦市長就職大典宣示市民的主權，象徵市政的獨立自主。這個慶典也是庶民階級的道德假期，人潮的動能一觸即發，街頭的失序在當日受到包容，行人必須自求多福。參觀的群眾既愛其熱鬧，卻又得提防隨時可能成爲暴力宣洩的對象。渥德和友人擠在人群中觀看市長的馬車隊伍列隊前進，也觀看四周擁擠的人群，突然之間：

> 婦女們尖叫著站不住腳了，孩童們大喊著快不能呼吸了，而男人們——當地人或外國人，也拚了命想挪動身體脫困。我自己則感到五臟六腑都要從嘴裡吐了出來……；我被夾在肚腩和臀部之間，活像一塊燙得平平整整的餐巾布，心裡直想和這群亂民一樣，大聲吶喊著『給我自由！給我自由！』 (Allen 32)

此時的隊伍另一頭有人掐了陰溝的水往旁邊的人後頸澆了下去，流入口袋裡，讓人濕了褲子和鞋子。車隊過去之後，人潮緊跟在後，洶湧的力道迫使渥德和友人攀上街旁的柱子，以免「遭暴民的巨大人潮捲走」。倫敦市民力量的展現，壯觀之中處處暗藏危險，訴求自由，卻也淪爲失序。這樣的嘉年華景象雖然充滿活力，但是與特洛埃和羅馬所象徵的帝國紀律與秩序，相去極爲

airiti

遙遠。

渥德的倫敦「紀實」出以嬉鬧的語調，波普(Alexander Pope, 1688-1744)則以仿諷史詩的體例，描寫倫敦暗巷的污穢。〈史賓賽：陋巷篇〉(“Spenser：The Alley”)(1727)仿《仙后》(*The Faerie Queene*)的詩節(每段九行，前八行爲抑揚五步格，第九行爲抑揚六步格)，誇張泰晤士河北岸勞動階級雜居的貧民區之髒亂，刻意與史賓賽(Edmund Spenser, 1552-1599)筆下的傳奇仙境形成對比，詩中有一段如下：

> 馬路上隨地都是破碎的石磚，這邊和那邊，
> 四處散落發臭的鯡魚；
> 就近的菸酒舖子倒是方便顧客，
> 雞、狗和豬也都來找吃食；
> 屋簷底下晾著一件行船人的外套，
> 門裡頭只見幾個曬得黝黑的悍婦，
> 補著破舊的漁網，
> 扯著喉嚨唱歌，一下子又叫罵連連，
> 青口白牙鬥嘴；看著就知道不是好地方。 (11.10-18)

波普詩作多循二元區隔的意象，在田園詩〈溫莎森林〉(“Windsor Forest”)(1713)中描繪「西邊」的田園形象，在諷刺詩《文丑傳》(*The Dunciad*)(1742)中則呈現「東邊」的邪惡墮落，利用既有的文類成規，將空間政治以文字包裝。溫莎森林「密蔭深處，／是君王與繆斯的莊園……久已迭失的伊甸園的蓁翠樹林，／在我的詩行再現生機，重顯綠意……／大千世界秩序井然，／萬

airiti

物姿色各異，卻也處處和諧」(11.1-2, 7-8, 15-16)。波普的鉅構《文丑傳》寫「愚昧女神」的勢力西進，企圖收復國土，正如撒旦企圖毀滅上帝所造的世界，重現太初的渾沌和黑暗。波普從他的知識制高點俯看蟄居市區煮字療饑的三流文人，將他們比爲「東邊」所滋生的反文明勢力，處心積慮向「西邊」的朝廷攀緣爬升，不啻如一群暴民席捲「西邊」的文明地區，而致「不列顛尼亞長眠」(“(making) Britannia sleep”)(I. 7)。[5] 波普將倫敦一分爲二，區隔文明與愚昧，品味及低俗；用文類成規(諷刺詩與田園詩)承載傳統的價值觀，認同道統，排拒新興的俗眾文化。此兩類詩的本質和語言原與「紀實」相去甚遠，但是波普借其體例承載當下的內容，批判時人時事，伸張自己的意志，也附予古典文類新時代的政治使命。

諷刺詩人呈現的倫敦率皆爲敗德的象徵，約翰笙(Samuel Johnson, 1709-1784)後半生的歲月都在倫敦渡過，在其諷刺詩〈倫敦〉(“London”)(1738)中比喻倫敦爲敗德之邦：

> 「歹毒」、「搶奪」、與「意外」三鬼共謀
> 暴民和祝融輪番上陣；
> 暗巷窩藏隨時出草的惡徒，
> 豺狼律師四處尋覓獵物；
> 這邊頭頂上響起樓塌的聲音，
> 那邊則有個不信神的女人說得口沫橫飛。 (11.13-18)

[5] 《文丑傳》劃分賢與不肖的地界，以「東邊」作爲文丑的窩巢，以「西邊」爲文明的轄區，最後文明不敵文丑暴民的摧殘，愚昧的勢力如洪水，吞噬英國文壇。參見宋美瑾，第四章。

airiti

此詩「模仿」公元一世紀諷刺詩人朱文納(Juvenal, 55-130)的“Tenth Satire”，將敗相畢露的羅馬轉譯爲倫敦，顛覆了倫敦的神話大論述。約翰笙雖然把倫敦的黑暗面描繪得如此不堪，但是也有一句眾所週知的名言傳世，歌頌倫敦的生命力(「一個人若厭倦了倫敦，也就表示厭倦了人生」)。文人擺盪於生命能量與失序的都會兩極現象之間，這樣的矛盾情懷在十八世紀的倫敦「紀實」文學中隨處可見。

倫敦既爲當時歐洲的首要都市，當然也吸引歐陸的訪客，有人短暫停留，有人居住較久。瑞士人索緒爾(Cesar de Saussure)在倫敦居住五年，甚爲厭惡其雜亂的街道和粗魯的市民，在他的記述中也提到新興的逛街購物的消費行爲：

> 倫敦的街道不是塵土飛揚就是步步泥濘，原因在於不斷地蓋房子，再加上不分晝夜，在街道上疾馳而過的各式馬車，有車頂的、敞篷的……。另外讓人討厭的是馬路上舖的磚到處碎裂，令馬車裡的乘客搖晃得難受……。四條主要的街道(斯特蘭德大街，艦隊街，契普賽和玉米丘)算是歐洲最體面的。更好玩有趣的是街上的商店和掛在店前的招牌，每間店頭各以不同材質——銅、錫鑞、木頭——製成，加上彩漆或鍍金。有些真是壯觀，恐怕花了一百英鎊不止的錢。……市長就職日是倫敦的重要假日，市民在當日特別粗暴喧鬧，把平日所享受的自由變質為無法無天的暴行。(Allen 53)

airiti

索緒爾特別提到倫敦市民的排外心態，外國人在看熱鬧的隊伍中很容易被揪出來羞辱，一概被稱爲「法國狗」，身上衣物被塗抹爛泥巴，暴民也把事先準備的死貓、死狗往他們扔擲。對自詡爲文明先進的歐陸人而言，市長就職日的倫敦街頭有如嘉年華會，失序中帶著冒險的刺激。索緒爾最後提到死刑犯被押解到街頭公開行刑，更是倫敦的奇景。犯人集體行刑，斷氣之後家屬快速領回，無人認領的屍體則淪爲大體解剖的素材，於是殯葬業和外科醫生爭相搶奪，在恐怖、哀傷的景象之外又添加了喧鬧的喜感。

小說家司模利特(Tobias Smollett, 1721-1771)筆下的倫敦則揉合褒貶，凸顯新舊交替之際，這個都會空間中無所不在的矛盾張力。這樣的矛盾修辭與諷刺詩的二元修辭大不相同，也更爲貼近真實人生。《韓福瑞克林可的遊歷》(*The Expedition of Humphry Clinker*)(1771)書中主角穿梭於倫敦不同的文化空間，記述另一種都市人的心情，夾雜愛恨，徬徨無所適：

> 倫敦於我是陌生之地：全新的街道和房舍，全新的情境。正如那個愛爾蘭人所說：「『倫敦』已經出了城，走向郊外。」以前所看到的一望無際的田野，曬著乾草、長著玉米，現在全鋪了馬路，蓋了廣場、皇宮、豪邸和教堂。我聽人說，短短的七年之中，光是西敏市的一個小區塊，就蓋了一萬一千多間新房子，更別提這個龐大都會的其他區塊每天都在增加的建築……。不容否認，倫敦和西敏兩地街道比從前整齊好走，照明也有改善，這是新世代的功勞……。但是，

airiti

> 雖然如此，這座首都已經變成龐然怪物，有朝一日發展失控，寡占所有資源，將令全國其他各地(好比政體的軀幹和四肢)萎縮衰敗。 (Allen 71)

司模利特接著敘述步行於渥克士豪的觀感，雖驚歎此地的巧妙園林設計，但也表達對雜遝的人群的嫌惡：

> 散步本應順應自然的法則，需要寂靜和涼蔭為伴，獨自為之。此地卻盡是人群，摩肩擦踵，喧鬧異常，每個人費勁吐納著夜晚躁鬱的濕氣，路旁幾柱街燈粧點著眼前的吵雜，閃閃發出微弱的光，看起來好像一支支廉價的蠟燭。 (Allen 72)

如此的倫敦夜景透露著矛盾，猶如熱鬧但又孤寂的鬼域。行走在大街上，看似融入人潮集體前進的個人，其實是疏離的；華麗的都市是噪音和燈影搭建的皮相。

世紀末的倫敦在布雷克的〈倫敦〉(“London”, *Songs of Experience*)(1794)一詩中更形陰鬱，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然如猛獸吃人，田園的寧靜童真被痛苦的經驗取代。司模利特筆下逛街的行者徘徊在愛憎兩端之間，布雷克的行者看到與記錄的卻只是貧瘠和苦難：

> 我走在每一條已被特權包租的街道，
> 在已被特權包租的泰晤士河岸，
> 看到迎面而來的每一張臉，

airiti

上面佈滿疲憊和憂苦的刻痕。
在每個男子的哀嚎聲裡，
在每個嬰兒的恐懼哭聲裡，
在每個聲音，每個咒罵聲裡，
我聽到心靈鐐銬發出的鏗鏘之聲。 (11.1-8)

布雷克將實景抽象化，也將苦和樂兩極化：倫敦的「純真」歡樂表相與真實的「經驗」，兩者之間橫亙著無法跨越的階級與經濟鴻溝。倫敦市的先知行者猶如遊歷地獄。正大步邁向帝國顛峰的英國，它的心臟其實是由下層庶民的痛苦所驅動，它的霸權在源頭即已鎖控庶民的身心。這樣的倫敦與〈溫莎森林〉的田園風光，可說是兩極化的「造景」手法，天堂與地獄皆在倫敦，心之鏡相映照出矛盾弔詭。文學家想像建構的倫敦奇異多樣，在更高的一層意義上，或許更貼近人生的真相。文學記錄多樣的景象，透過主觀想像的渲染，描繪倫敦的外表和文化底層的矛盾扞格，卻毋寧更爲真實地呈現文化地誌學的弔詭。

結語

倫敦的文字圖像充滿歧義。從文藝復興時期的建城神話到十八世紀的所謂「紀實」呈現，帝國的大論述被日常的細瑣論述取代。特洛埃與羅馬的典範逐漸銷蝕，朝廷和市民的權力角力則變身匿藏在「西邊」與「東邊」的文化區隔之間。1666 年大火之後，阮恩在倫敦的廢墟上看見他大展身手的好時機。他的都市重建計劃企圖將已逝的帝國神話起死回生，棋盤式的街道規劃師法

airiti

羅馬(Hudson 529)，將都市的市民生活空間視爲帝國霸權的政治舞台。阮恩的雙重身分——牛津大學教授和皇家學會的元老創始會員——使他據有啓蒙運動的導師地位，他規劃的藍圖也成爲威權與王權的表徵，與真正市井百姓的實際需求相去甚遠。自十二世紀開始的朝廷與市民之間的頡頏競爭的態勢，其實未曾一日鬆弛。阮恩的藍圖停留於紙上作業，民間的活力與市場動能自行驅使市景(cityscape)順應自然的法則發展，企圖達致市民的「自由」。

倫敦建城與日後朝向帝國之都的發展，其修辭想像擺盪在神話與紀實，以及褒貶愛憎的兩極之間。波普描寫「西邊」與「東邊」之對立，約翰笙於詩中表達抽象的憎嫌，卻也擁抱倫敦的真實人生。渥德與史模立特筆下的倫敦街頭的行路人，帶有些許班雅明(Walter Benjamin)所稱「閒散的逛街人」(flaneur)的質性，置身消費文化的都市街頭，卻冷眼旁觀，體會都市街頭的種種矛盾弔詭。人潮未能化解疏離，憎惡卻又牽動愛欲。都市文學最終捕捉的是人性的深層矛盾，演繹一則弔詭的想像論述。自布雷克之後，十九世紀的倫敦文學更跨入一個新的里程。此一炫目多彩的課題綿亙至今數世紀，其廣度與豐富的文化意涵盤根錯節，浩浩蕩蕩。本文僅只討論其初始的論述建構與文學中的呈現，用以檢視其中的意識運作。。

airiti

引用書目

Allen, Rick. *The Moving Pageant: A Literary Sourcebook on London Street-life,* 1700-1914.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8.

Bowers, F. Ed. *The Dramatic Works of Thomas Dekker.* 4 Vols., Cambridge, 1968.

Hudson, Nicholas. "Samuel Johnson, Urban Culture, and the Geography of Postfire London." *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, 1500-1900* 42.3（2002）：577-600.

Manley, Lawrence. *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London*. Cambridge: Cambridge UP, 1995.

Merritt, J. F. Ed. *Imagining Early Modern London: Perceptions and Portrayals of the City from Stow to Strype, 1598-1720.* New York: Cambridge UP, 2001.

O'Connell, Sheila. *London 1753.* London: The British Museum Press, 2003.

Porter, Roy. *London, A Social History.* Cambridge, Mass.: Harvard UP, 1995.

Riley, H. T. Ed. *The Whole Book of the City of London*. London: Camden Society, 1862.

Twyning, John. *London Dispossessed: Literature and Social Space in the Early Modern City.* New York: St. Martin's Press, 1998.

Wilson, F. Ed. *The Plague Pamphlets of Thomas Dekker.* Oxford, 1925.

宋美瑾。《十八世紀英國文學—諷刺詩與小說》台北：三民書局，1995。